

选举

何春蕤

有位朋友说得好，「选举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动员无钱无势的人出来表态」。意思就是说，选举并不会真的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或社会不公，选举只不过为有钱有势的那些人提供一个机会较劲，胜利的人便会有许可证在任期内进行各种活动来更增加其钱与势，而无钱无势的人则继续在边线外奋力的活着。

对选举完全不理会的人有些是因为这般看透了选举而不想管选举的事，但是有更多的人根本没想过要把选举列入注意范围。他（她）们或是在 PUB 中流连竞夜，在 KTV 中纵情欢唱，或是在地摊上忙于谋生，在地下工厂中挥汗拷贝偶像照片与录音带，或者竟只是赖在沙发上用遥控器一遍又一遍的浏览六十个频道。不管如何，他（她）们的生活已建构成没有空间容纳选举的激情或义愤。

看到这种情景，总有一些热情的人义正辞严的劝诫他（她）们放下冷漠：「你不要以为选举不重要，被选出来的人所制订的政策绝对会影响到你的。」一面说，一面还在脸上泛起一层因为亲身参与重大历史事件而来的神圣光采。

可是，对那些不想也根本不理选举的人而言，选举根本不重要。他（她）们正忙于进行一件真正

重要的事情，即便是营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在私领域中的营造绝对是重要的，因为连公领域也非常看重这种营造。若是私领域中运作的方式和逻辑严重的违背公领域所规范的模式，而且还有扩散的趋势，公领域透过选举而来的正当权力便立刻会以暴力加以制裁或甚至扑灭。历史上不少小团体、小公社、小教派，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消失的。

由此看来，选举之所以被视为「重要」，是建立在公领域对私领域的管辖和宰制上。

于是，不理选举的人有此狂想：

假如他们制定了法律却没有人遵守，假如他们选出了官吏却没有人听令，假如他们举办了一场选举却没有人理会……

后记：

这篇短文刊出后，周奕成先生在一篇题为「〈给我报报〉地方版」的文章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提到这篇短文，并有所批评。

由于周文是在谈〈给我报报〉的脉络下提及拙文，涉及颇广，我无法在此针锋相对地回应他，所以仅能大略谈谈我的看法，目的在于澄清拙文。

周文认为我的论点：

或许显示出一些「去政治化」的倾向，以及对台湾社会欠缺现实感与历史感。如果能具体分析县长选举的政治经济意义应该可以看出土地及资本是核心问题。地方派系为了地皮炒作而动员，任何一个县市长的当选人，都会因为其职权而对该县市的土地资源分配造成重大影响，这也直接冲击了每一个人的居住问题，形塑了每一个人的营生方式。光从这个面向看来，「私领域的营造」，难道不是和公领域、和生产关系、和所有其他人的政治参与密不可分吗？人们的汲汲于私人营生活动，而无暇从事政治行动，难道是自愿的而非被排除、被宰制的吗？

首先，周文似乎把目前这种民意调查式的选举看做「政治参与」，这是值得商榷的。此外，很明显的，在目前这种选举下大多数人的命运不会因选举结果而有所改善，对这些人而言，她（他）们对选举的论述策略应该是什么呢？难道要继续歌颂选举的重要吗？

我在正文中说：「选举之所以被视为『重要』，是建立在公领域对私领域的管辖和支配」。这也就是说，公领域对私领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完全否认许多无暇从事政治行动的人是被生活所迫而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周文因此根本没有碰到我文章的重点，亦即，如果这些被迫排除在政治过程外的人不能透过目前这种选举改善其现实，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策略呢？

我建议了一种（但绝非唯一）策略，也就是私领域世界的营造。这个策略的背后有许多预设，我并没有在文章中把它们提出来。其中之一，也是正文比较明白提及的，就是私领域的营造也会对外领域有所影响。我很明白，在传统父权的权力图象中，这种私对公的影响或「私人即政治」的想法是比较不具地位

的。但是我们应该开始思考这种另类政治的可能性。

「私人的汲汲营生」并不等于我所谓「私领域的营造」，这是我在文中并未说清楚的。但是对各种私领域内的实践（汲汲营生在内）均可以首先在论述的层次上加以肯定，赋予新意义，而这就是私领域营造的第一步，之后还要有更多更新奇的论述来谈论「私」的实践，使之不同于原来主流谈论这些实践的方式，并且使之成为某些主体反抗主流权力的论述。

周文在提到我的文章「对台湾社会欠缺现实感与历史感」或者「……是核心问题」时，都显示了他的立场是某些对现实有客观认识的菁英主体，他们已经把现实分析透彻。但是问题是，其他的人怎么办？跟着菁英做投票部队？其他人所面对的台湾社会现实和历史因此都是虚幻的？

或许菁英们可以先承认别人的现实也是现实，别人的实践领域（卧房）和菁英的实践场域（立法院）一样重要，别人关心的核心问题（像性高潮）和菁英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平等地位，这虽然是第一步，但是已经改变了一小部分现实，改变了这个社会「菁英——群众」权力逻辑，改变了菁英的身段。